

文苑 拾影



5.7
山东大学出版社

文苑拾影 臧云远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丘一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印张：5.75 字数：12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607-0094-2/I·17

定价：1.70元



序

刘 海 粟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写照》一书中，他以多彩的健笔，给列宁、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历史人物留下了生动的剪影，而对安德列也夫的回忆，更是绘形绘声，剖出对方灵魂，呈现自己胸臆，象浮雕一样凸出，读来久久难忘。

看来，性格决定人的行为，加上机遇（包括时代、国家等大环境和生活地点、周围人物、风俗习惯、教育条件等具体的小环境）便是传记的素材，亿万人的经历和杰出活动家的言行便是历史。为此，人们特别爱看史实详明、文笔优美的回忆录，情趣盎然的书简，考订精确的年谱。

回忆录的写作本无定格，大抵都是史料性文字性并重，真实第一，文采抒情因素次之。中国古代人写的回忆性著作，在形式上堪称多种多样，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千读不厌；《陶庵梦忆》、《梅影庵忆语》，画面生动，虽是身边琐事，寓有兴亡之感；《浮生六记》、《三依赞人广自序》，用白描手法，情海波澜，不掩世态，跌宕多姿；《万里寻兄记》、《鸣机夜课图记》、《背影》、《朝花夕拾》，各抒至情，感人肺腑。鲁迅妙笔，更见机智幽默，言有尽而意无穷。

时代前进了，读者的要求也随之而变迁。仅仅写写身边小事，儿女情长，远离时代风云，不见世态的野花，在散文园地中可备一格，毕竟不能满足高水平读者的审美需求，他们希望读到有广阔历史背景、栩栩如生的人物，个人内心世界坦率恳切的剖析，在文字上能给人启示和艺术享受的回忆之作，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自己身上弱点讳的粉饰之文，不会打动读者。离开真，善与美都不能存在。

所谓真，只是如实反映全貌，言必有据。允许有剪裁，不是有忆必录，巨细不分，主次混淆，流于繁琐芜杂。水分过多，读来即使不能催眠，也将味如嚼蜡。

有一天，文辉送我两本杂志，封面上印的都是一个少女的侧面像，秀眉下的星眼，熠熠流辉，两腮白里泛红，加上天真的酒窝，端庄匀称的轮廓，充满朝气，我想古人描绘的美女也不能比影中人漂亮，这是他友人的孙女，但脸的另有一面有一大片青斑，从眼泡到鼻翼，不仅铁青。还长着粗密的茸毛，尽管姑娘读书很用功，工作很有成效，上过光荣榜，却找不到男朋友。杂志的封面当然应该印美好的形象，如果用拍侧面象的方法来写回忆录，就太不全面，虽然有一半真实，也不能成为信史。即使有半边不漂亮，坦率亮出来，并不损害威信与美感。遮遮掩掩，反而降低格调，连真实的一半也不会取信于读者了。

云远兄与我共事近四十年，他是老资格的革命诗人，参加过东京左联活动，编辑过《杂文》、《质文》等有影响的杂志，抗战期间主编《自由中国》，很早便到过延安，又在重庆同郭沫若、田汉、茅盾、老舍、巴金、高兰有过交往，与郁达夫、王亚平、丘东平都很接近，写过许多诗，还为张权

写过歌剧《秋子》，给孩子剧团写过《法西斯丧钟响了》，这个大型活报剧由王云阶作曲，吴晓邦编舞，也算一时之盛。

云逸兄成为诗人，并不是因为他有惊人的天才，他的成功靠自己的勤奋，更重要的是时代风云，革命雨露，把他造就出来的。

他以诗人的眼光与笔触，经过十载沉思，写出这本《文苑拾影》，老老实实，不露声华，文如其人，朝花夕拾，留赠来者。以他很不平静的漫长阅历，值得一忆无妨一写的东西，当不限于此书，韶华易逝，岁月难追，能回忆这些事物的人也日益凋谢。我读此稿，欣欣然有所思，有所忆，有所悟，犹如暮年兄弟，怡然对坐于金陵大江滩上，茶香撩人，涛声盈耳，帆影错杂，汽笛交鸣，听他娓娓谈来，异常亲切。于是如烟往事，呈现眼前。有息息相通之妙，而无隔雾看花之恨。所以很愉快地献给朋友们，犹如一杯清淡而具回味的碧萝春茶。

爱回忆是老年人的特点，但也不能老是停留在回忆上。写回忆录也不应当是最美而又是最后的天鹅之歌。云逸兄的热情已逝于当年，精力尚不输于往日。而风涛历尽，慧眼方开，峰顶回头，妙景联翩。少壮作诗未必耐咀嚼，老来奋笔，点铁成金。对于老年朋友，我也和对中青年人一样寄以厚望：

不薄中青厚老年，前因参透识愚贤；
晚霞理灿飞花雨，白发犹需猛着鞭！

目 录

序.....	刘海粟
三到南京.....	(1)
千叶木屋话诗文.....	(9)
云集大武汉.....	(18)
亲切的教诲.....	(31)
从天官府到赖家桥.....	(44)
雾茫茫山城诗话.....	(59)
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	(74)
在山城学习毛主席《讲话》.....	(80)
曾家岩一席话.....	(83)
你见过鲁迅吗?.....	(86)
缅怀茅盾先生.....	(92)
记郁达夫.....	(97)
记田汉先生.....	(102)
记诗人王统照.....	(107)
老舍与孟泰.....	(113)
缅怀李公朴.....	(119)
记朗诵诗人高兰.....	(123)
海滨思故人.....	(128)
关于大歌剧《秋子》.....	(131)
关于《法西斯丧钟响了》.....	(133)
哈尔滨剪影.....	(137)
长春忆旧.....	(142)

旅大风情.....	(146)
五到济南.....	(151)
今日蓬莱.....	(155)
北平当年.....	(164)
作者简介.....	(176)

三 到 南 京

一

1931年北平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的消息传来了。谁也没有心思上自习了。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礼堂里，有的责骂丧权辱国、花天酒地的军阀，有的眼泪汪汪默默不语，一位东北同学啼出了声音。七嘴八舌中，不知谁叫道：“学生会主席哪去了？我们开会！”我从人群中走上了讲台，谈了些爱国反帝的話，几位东北同学抱头大哭起来，一阵沉静中，谁喊道：

“国破家亡了，我们怎么办？”大家决定分头到各校去联系。各校大多已听到消息，也都是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谈论起救国之道。一时，全市青年，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奔走宣传，有的走上街头，有的集会议论，顿时救亡爱国的空气活跃起来，也无心读书作习题了。

当时，北平虽然一个军阀走了又换上一个，大多是挂个国民党的牌子，还是军阀一套的老样子。学校里学术自由，各家各派，上课、言论随便，无人过问。那时我高中还没毕业，课本如数学、理化、世界史地等等都是用的英文。初大告先生给我们上英语，用英语讲《威克菲尔牧师传》，学生回答也是用英语。国文老师是李大钊的一位同乡，给我们讲李大钊从小如何刻苦学习。他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冬天披着一

件老棉袄，钻研学术，追求人生真谛。骂张作霖把这样好的人害了。张坐火车回沈阳叫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也骂日本帝国主义。他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史记》、《左传》背得烂熟的。

我们几位同学喜欢文艺，啃莎士比亚和歌德，不管懂的程度如何，却都是津津有味，你背一句，我背一句的。好象小时候在蓬莱赶海一样，退潮时到海里拾到什么海味，都认为是最好的。

当然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也都崇拜，真是高山仰之。事变以前，在同学李南桌家里，几个人忽然心血来潮，要办个文艺杂志，拟定好题目，分头去“创作”，刊物定名叫《晓声》，天亮时的声音，对勤奋的人是最美的，朝霞满天，风吹树舞，迎接新生命的开始。大家凑印刷费，创刊号居然印出来了。我写的是一篇小说，记叙蓬莱海边，兵荒马乱中，演社戏，骂军阀的故事。象抱着心爱的婴儿一样，一包一包送到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还得说些好话。过几天去看，一本也没卖出去，无名小卒的刊物，谁看得上眼。本来想第一期卖光了，第二期的印刷费就有了。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来了。

经过几天的奔跑和酝酿，各校学生会决定先到南京去请愿。车站办事人员，也是一片爱国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开出一列专车。学生们浩浩荡荡，一路歌声，到了浦口。南京的学生代表，等候在车站张罗，到江边码头，坐上轮渡到了下关。一望奔腾不息的大江，浪花飞溅，急流拍岸，正与青年的豪情壮志融汇一起，滚滚泻泻，在谱写着救亡的壮歌。

又坐上南京特有的小火车进了城，在鸡鸣寺下车，就到了中央大学新盖的大礼堂，按学校分队，一人一个座位。第二天接到通知，说是蒋介石要接见北平来的学生，有人领着到中央军校的小礼堂，刚坐下，舞台上走出一名个子不高的秃头军人。“你们要相信我蒋介石，决不丧权辱国，一定会收复失地，你们要回去好好读书……”，谈了十几分钟，他走进去了，台下鸦雀无声。过了一会，谁叫了一声“走呵”，一哄而散。大家在长长的中山东路上，议论纷纷，队伍乱七八糟。第二批北平学生南下，车站上就接到南京的通知，不敢开专车了，学生就自己开，请愿不行就南下示威。到了南京，蒋介石就不敢再露面了，叫当时的行政院长陈铭枢出来。花言巧语骗不了学生了，却叫学生揍了两下。上海的学生闻风而来，参加示威的行列，一时全国的学生，爱国情绪高涨，弄得国民党无可奈何。又不能说不爱国，东三省不要了，又没法开口，说收复失地却又按兵不动，热血青年能不火吗？

有一位满族的东北同学跟我很要好。他英文“倍儿棒”，能熟练地背诵着雪莱、拜伦的诗句。我们一道到了夫子庙，去看秦淮河。在北平每逢假期，我跑到清华园去游泳。那时那里有几位蓬莱同乡，都是长辈。有位姓邹的是朱自清的北大同班同学，朱自清那时是清华大学的讲师，出了散文集子，送给邹某学长，我拿来看了，把个秦淮河写得多美。到秦淮河一看，糟了，韵味全非。仿佛河水悠悠，流不尽哀愁，几艘画舫陈旧，两岸退色紧闭的酒楼。只有夫子庙前，熙熙攘攘，三教九流，耍把戏的，卖膏药的，一排排货摊，人们无精打采，川流不息。我们走到一个新建的百货商场，楼上

楼下，转了一圈。那位东北同学说，买个纪念品吧。他买了把小洋刀，我买了一付金色的衬衣袖扣。无心在弦歌凄凉的街头停留，茶馆里传出卖唱的歌声，仿佛都有国难临头的意味。我想清华园中，古月堂侧的小河和荷塘，恐怕也蒙上了淡淡的哀愁，不再那么清幽雅致了吧。那时古月堂是清华的女生宿舍，也许正有东北女儿，徘徊在河边荷塘，悲痛落泪，惦念着家人呢。

二

1937年春3月，我来去匆匆，从东京到了北平，又回到青岛，到蓬莱住了些时日，整理着诗稿。“七七”事变，芦沟桥战火纷飞了。我匆匆忙忙到济南前线，住在一家工厂的小楼里。敌人飞机每天嗡嗡地在上空，象蜻蜓似的飞来飞去，有时丢下五磅重的小炸弹，落在珍珠泉的空地上，炸个不大不小的土坑。

一天东京质文社同人丘东平来了，他是跟着翁将军到前线来的，我陪他跑了几夭。他说：“你呆在济南干什么，我们一道走吧。”我说：“好”。就跟着他坐上兵车到了南京，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了。丘把我领到宁海路一号住下。这座小楼住了许多人，质文社同人陈辛人也住在那里，丘给我介绍了叶挺将军，原来这里是新四军的筹备处。叶挺这位北伐的常胜将军，真是英俊率极了。他言语不多，时常一个人在饭厅的空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隔着窗纱望庭院的丁香和天空的飞云，大约他在想念延安和江南要改编的游击队吧。

有一天刚吃过晚饭，上了小楼，董必武和陆定一同志来了。叶挺将军把我介绍给董老，说这是诗人。丘东平给我介绍陆定一说：“这是我的团长”。原来在海陆丰时，丘是儿

童团小朋友，陆定一是儿童团团长。当然，现在都长大了。陆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丘也以海陆丰的革命故事写了很多小说。大家谈到文化文艺的问题时，董老指着陆一定说：“他是我们的专家。”陆笑着说：“哪里哪里。”

一天在饭桌上，叶挺将军谈起铁军北伐时的情况。最后他说治军纪律一定要严！在一次攻打敌阵时，他视察前线，在路上遇到一个开小差的逃兵，他马上举起手枪执行了军纪。同桌吃饭的还有两位北大教授。一位是许德珩，一位是陈希梦。记得1933年在北平，许德珩曾因爱国演讲而被捕，押在第二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候外庐也有类似的遭遇。都因群众反对，营救的呼声高涨，反动派不得不把他们释放。何思敬教授有一天来了，也同桌吃饭，陈辛人给我介绍，说是华南救国会的。他以后到了延安。人很和气，我跟他谈了很久。

有一天大家没事，丘东平提议，与陈辛人一道到玄武湖去。大约是因为上海也打起来的缘故，街面上已失去往日的安祥闲散的景象。到了玄武湖，仿佛游人也沒往日多了。那时玄武湖不要门票，一进门，湖堤两旁排满席棚小吃店，有点象北平伏天的什刹海。荷花盛开，红多白少，一艘艘画舫，慢悠悠在荷花丛中飘荡，除了一条水路，看不到湖水的荡漾。一阵风来，荷叶摆动，荷花惊惶失措。我们吃了几家小吃，丘东平大谈他的写小说计划，陈辛人文文雅雅不大作声。解放后，华东文联开会时，陈毅同志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报告。当中提到新四军有位作家，没有看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只对高尔基的小说有研究，指的就是丘东平。丘东平在苏北创办鲁艺，与日本兵遭遇，战死在水车旁。

不知不觉到了梁洲，望着菱洲头上一条垂柳长堤，古诗中“十里长堤柳如烟”大约就是那里了。这时千里江南，山山水水风尘仆仆中，有一个人长衫礼帽，带着党中央的通知，奔赴各个游击队的驻地，豪情满怀，英俊爽朗，胆大心细，收集红军部队改编新四军，这就是当时的陈毅将军。

三

1946年初夏，在山城重庆，抗战胜利快一年了。脚底下人（四川话，叫长江下游的人），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乘车），水上飘的（坐船），能走的都走了。吴老玉章留在重庆坐阵，一天张友渔同志找我谈话，提到办理交通的事。过几天由何其芳同志送来两张船票，一张是给王亚平的，另一张给我。我们在朝天门江面呆了一宿，第二天天亮，顺流而下。经三峡，过险滩，一出三峡，真是天地平野阔了。这几年，天天上坡下石坂，仿佛天空都挤小了。过武汉，宿九江，庐山灰紫屏障，孤山峭立江面。沿岸风光，婉如梦中初醒，犹有战火的伤痕。船停南京，下关码头忙忙乱乱，坐上小火车到了城里，住在广东会馆。周恩来副主席听说我们到了南京，要见我们。叫戈矛与我们约定，到时我与王亚平一道到了梅园新村。走进整洁的院落，仿佛四邻窗口都是贼头贼脑贼眼睛。小楼西边会客兼用餐，东边是卧室兼办公，楼上与延安电讯联络。屋前两棵小小翠柏，日夜为主人站岗守卫。我们刚坐下，周副主席穿着天蓝色的便服，目光炯炯，面带笑容地走进来了。因为在重庆多次相见，也不用介绍。握手坐定以后，周副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得到消息，陶行知在上海逝世了。言下凄然若失。我注意到小圆桌的大海碗里，放着二三十颗洁净透明红光闪烁的雨花石，沐浴在水中，

那样肃静。水面上映着窗帘随风飘动，偶尔露出天光云影。

国民党反动派撕毁重庆协议，两面三刀，从峨嵋山下来，暗自布置内战。为了促使国民党实现诺言，李公朴、闻一多前后在昆明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于街头。真是争取民主的烈士，知识分子的英雄。陶行知虽不是死于特务之手，却是叫反动派背信弃义气死的。

周副主席的浓重眉宇之间，刹时有沉重的阴影。但一会儿，眉头一动，有一种坚强的信念，却又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周副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亲切地与文艺界的人士交谈，总使你感到他是以平等的态度，以心交心，他谈的话没有教条，使你乐于接受，从心里感激他。当然他受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诡计多端，花样百出，笑里藏刀，凶狠恶毒，处境是困难的。但这一切都在他明察秋毫的眼神里，他那样坚定自若，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谈笑间指挥若定，胜利在握。我想着小楼上的电台，夜夜使周副主席的心与延安毛主席的伟大心胸连在一起，为国家民族为人民革命，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在严肃繁忙的工作中，院落里秧歌时起，乒乓球桌前笑声不断，使四邻窗口的贼眼迷迷糊糊，眼花缭乱，莫可奈何。这是怎样的一个战场呵！

我与亚平辞别了周副主席，他亲切微笑着站在小楼屋檐下。我们与戈予、剑虹，过街到了十七号，范长江同志在会议室的长桌旁等着我们。他是在苏北待了五六年，才来到南京的，免不了问长问短，各自谈了些情况。剑虹在一旁对我说：“钱瑛大姐问起你到了南京没有”。我说：“对啦，我就去找她”。

一天小雨霏霏时落时停，戈矛和剑虹来了，说是要陪我们去看看南京，就一道到了夫子庙。站在秦淮河小桥上，望着二三小鸟从乌衣巷口，飞过河面，落在柳枝上，不禁念出：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经过战乱，真是人世沧桑。而今天上飞来的接收大员，正得意洋洋于大江南北，又在发国难财、吃磨擦饭了。河面上破旧的画舫，停在岸边，远远传来茶馆酒楼的歌声，噪音不合时调，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我们沿街漫步，不知不觉到了商场门前，十几年前南下示威的情景，历历在目，而那位东北的同学，也不知飘落在何方了。

剑虹游兴不减，提议到玄武湖用餐。到了公园只见满园一片绿，荷花未开，荷叶已很高了。戈矛、剑虹二位东道主，也许坐着车从梅园新村出发，先甩掉了尾巴（特务的跟踪），然后自由自在地跟我们一道。也许他们是以整月的津贴费来款待我们，真有点于心不安，但又是盛情难却。没办法，由他们高兴怎样吧。不过他们能得一日之闲，跟我们一道轻松，到也是美滋滋的。

我们谈到周公和邓大姐到过雨花台。雨花台留下美丽的神话故事，如今满目疮痍，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革命志士的刑场，十万志士惨遭杀害。周公和邓大姐在反动派的胡扯漫缠中，漫步在雨花台，拾颗雨花石，来悼念战友，告慰烈士。

我们坐在湖边的茶座，望着巍峨的钟山。心想着如带的长江滚滚东流和江北运河两岸，新四军正严阵以待，准备万一，要在苏北千里平原与反动派周旋。所以虽是安排了一日的轻松，而心里却还是沉甸甸的，仿佛是压在钟山下面一样。

1979年7月29日于金陵金川河畔

千叶木屋话诗文

——记郭老40年前与文艺青年谈诗文

6月13日夜，忽接《诗刊》来电，约写郭老诗文，并囑通话。我想郭老已逾85高龄，也许是纪念他创作生活60周年吧。翌日接通电话，我说已写就《红岩九歌》，是纪念周总理的，内有“赖家桥畔”一节写的郭老。哪知电话中竟传来郭老昨日去世的噩耗，悲痛何似。当即草一唁电，辞曰：

钟山呜咽，大江哀号。

诗坛北斗，革命文豪。

才华如海，考古创造。

千秋诗文，永怀郭老。

郭老数10年对革命文化文艺的创造性劳动，成就辉煌，射猎宽广。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嘉陵江畔对我谈的：“郭老所以能如此，是因他心胸博大，提得起，放得下。拿起一样，专心致意攻下去，完成了，又拿起别的。别人是难办的，起码我就不成。真是一代巨人，多才多艺”。这是历史学家对郭老的评语。

40几年前我在东京的四五年间曾与郭老过从较密，郭老对后辈文艺青年关怀倍至。现就亲耳聆听郭老所谈诗文，记述二三事，以表悼念。

一、第一次拜访

郭老投笔从戎，驰骋在北伐战场。在几万战士的广场上，作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报告。用诗一般的语言，优美的四川腔调。那时他30几岁。“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他写下革命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大快人心，争相传诵。他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随后到了上海，因病又去日本千叶。千叶木屋，十年光阴，他俯案抒写，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战争与和平》，从事考古研究，甲骨、钟鼎文的考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科学地阐述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崩溃，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几多寒暑，夜夜灯下，他奋笔著书，从不间断。博览强记，思绪弛奔。思想火花，锐利独到。如历史上启蒙大师一样，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从上海、北平去东京的文艺青年多起来了。上海来的左联同人合计办刊物，北平来的左联同人也合计办刊物。以后就合起来办《杂文》，《杂文》是鲁迅先生起的名，得到他的关怀，并还寄来文章支持。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先生也支持这个刊物，常常给写文章。有一天魏猛克对我谈，郭先生问秀沅是谁，我们一起去看望他吧。原来我用秀沅的笔名，在《杂文》上写了一首小诗，也引起郭先生注意了。

我们在东京车站，弄了两瓶啤酒，坐上高架电车到了千叶。走到郭先生住处，一所普通的日本式木屋，屋里小桌上摆着厚厚的十二册甲骨钟鼎的研究著作。郭先生当时40几岁，我们是20多岁的文艺青年。席地而坐，谈起文艺来。

我说：杨振声是我的蓬莱老乡，在他那里，我看到“五四”时期的新诗歌。当时北平的几位写的新诗，虽然用了口